

叙述内外的身份建构

——兼评保罗·科布利的《叙述》

曹韵竹

作者：〔英〕保罗·科布利

译者：方小莉

书名：《叙述》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

ISBN：978-7-5690-0436-6

叙述是人类体察、理解和再现世界的方式。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在《叙述》一书中说道：“人类有叙述的冲动……人类持续不断地讲述故事，描述事件，将世界的各个侧面压缩进叙事形式。”（科布利，2007，p. 1）人类通过叙述来把握其与时间和空间的复杂关系，试图通过不同叙述手段意向性地重组时空关系，将经验组织进故事正是人类思考和记录世界的基本方式。叙述的起源与发展承载了人类主体意识形成和身份建构的历史，叙述的历史是一部关于主体身份的建构史。

叙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意行为，而是一个进程（方小莉，2017，p. 258），一个涉及叙述各主体间对话与协商的事件。从口头到书面再到图像叙述，在人类将其主体意识投射于叙述行为的过程中，不同叙述主体的分裂与重构也在叙述内部发生。在叙述外部，人类通过对事件的过滤、选择与重组来实现再现世界和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意图；在叙述内部，随着人类对叙述定义和需求的变化，以叙述者为代表的各叙述主体也经历了分裂和重构的过程。本文以叙述与人类的关系和叙述自身的发展为切入点，结合保罗·科布利的《叙述》一书，试图回溯人类通过叙述来建构和表达自我主体的过程，以及叙述行为内部各主体的分裂与重构，重点聚焦于在叙述发展历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叙述者与作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变化关系。

一、叙述外：人类身份的表达与建构

保罗·科布利的《叙述》一书结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对叙述的起源、发展和变革做了历时性回溯，探讨了叙述与人类自我意识和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叙述的起源具有较大争议，科布利在书中谈到两种互相交织的追踪叙述历史的视角：从人类心理和生理构成切入的个体发生学视角以及从人类文化演变切入的种系发生学视角。前者倾向于探讨人类童年时期的类叙述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如游戏和对话等。后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的“二分心智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发展出自我意识后，将这个“模拟之我”（科布利，2007，p. 15）组织进叙述中，但他们并不认为脑海中的声音来源于自我，而是将其视作古代神话中众神的启示，进而在心中形成二分的意识。由此可见，在人类混沌的自我意识萌芽之初，叙述就作为一种功能性行为帮助人类巩固和确立自我身份。

而后随着族群社会的建立，人类想要记录和再现过去的冲动不断增强，史诗等口头叙述形式得以成形和发展。“口头叙述有助于记忆”（科布利，2017，p. 25）。最初的口头叙述成为人类集体记忆和历史的载体，与此同时为了方便记忆和流传，口头叙述也逐渐发展出独具特点的形式和标志，如固定的模式和重复的节奏等。由于口头叙述大多涉及民族英雄史诗或其他集体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叙述行为展开的当下，“叙述也通过提供一个‘同时’（meanwhile）的概念从而凝聚民族的个体”（科布利，2017，p. 25）。因此，叙述能唤起特定族群的情感共鸣，具有建构集体身份和公共文化的凝聚作用。叙述行为对于被叙述事件具有高度选择性，而选择同时意味着排除：一个集体的内部叙述通常涵盖了这一群体的共同回忆和历史，而不属于该群体的个体则无法参与叙述。集体感和个体归属感在叙述中得到加强，“叙述中包含的记忆对形成和维持民族自我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科布利，2017，p. 25）。在人类群体身份意识遮蔽了个体自我意识的时期，叙述行为帮助人类确立和建构集体身份。

“个人主义意识是读写文化的重要产物”（科布利，2017，p. 51），书面叙述的出现为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口头叙述重在强调叙述行为当下听者的记忆能力，其重复的韵律和节奏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听者记忆。书面叙述则不然，书写让话语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得以长时间留存和被读者反复阅读。读者不再只专注于记忆叙述内容，他们拥有充足的时间对叙述内容进行审视、思考和修正，并以叙述为媒介对自我身份进行沉思和建构。

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书面叙述行为不再局限于公共场域内，每一个读者个体都拥有私密的阅读空间，个体读者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启蒙精神的引领下，个体身份在叙述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18世纪出现的小说大多注重再现个体经历或描绘个体心理，如成长小说类别（bildungsroman）。叙述不再只是族群历史的见证，个体身份的定义在叙述中不断得以彰显。然而到了19世纪，科技的发展迅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类得以意识到其所处的社会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个体身份不再仅由个人陈述和确立，锚定于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是个体的独特本质。于是该时期的叙述“从对个人心理的强调开始转向更细节地探索可识别的社会结构中个体间的关系”（科布利，2017，p. 57）。人类对自身与社会环境的耦合关系的体悟也在19世纪后期诸如自然主义小说中得到表现。

现代主义的到来打破了人类对主体完整性的认识和追求，个体自我的分裂和碎片化进程让叙述行为完整有序地表述人类身份的工作难以为继。“‘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意识由无数的力量决定，远远不是由自我认知来统一”（科布利，2017，p. 94）。叙述中开始出现多声现象，不再由叙述者一人独揽全局，叙述形式的创新体现出人类对自我多重和多元身份的理解与反思。继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渐膨胀，不再存在代表全人类的统一的叙述形式或风格，叙述的杂糅性不断增强。后现代叙述中出现的“断裂”（科布利，2017，p. 108）手法，即元叙述特性、叙述的自我指涉特征，也突显出人类张扬的自我身份不再甘于隐藏在单纯进行陈述的叙述者身份之下。用叙述打破叙述，这也许是后现代人类行使自我特权的表现之一。

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的迅速流行让当下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有资格成为作者或叙述者，成为自我身份的书写者。互联网为当下社会中叙述的即时和广泛传播提供保障。叙述也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法律、政治、教育、娱乐领域的叙述性日渐增强，逐渐发生“叙述学转向”（赵毅衡，2013，p. 12）。用以定义个体的群体身份不断在背景中淡化，叙述者也不再关注叙述是否能引起某个共同体内的共鸣，叙述行为本身已然成为个体构建的自我身份的一部分。在叙述者的对面，读者能动地参与阅读活动甚至叙述行为，成为叙述主体的一环。科布利认为，根据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叙述是卷入符号的行为，而符号具有对话性，即受述者一方也承担着“二次叙述化”（科布利，2017，p. 106）的功能。叙述早已不是叙述者和作者的特权，读者对作品的解读过程也是其自我书写的方式之一，认知叙述学的研究从心理视角揭示了叙述和人类心理的相互关系。叙述学转向和读者转向这两个历史性趋势为未

来的叙述和人类身份建构建立了崭新的模式。

二、叙述内：叙述主体的分裂与重构

科布利在《叙述》一书中不仅结合人类大历史背景探讨了叙述与人类主体意识的关系，还细致地从叙述学角度剖析了叙述行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口头叙述到书面叙述再到图像叙述，叙述行为主体经历了一系列分裂和重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叙述主体当属叙述者。科布利对叙述的定义是，“‘叙述’是对这些事件的展示或讲述，以及展示或讲述所采用的模式”（科布利，2007，p. 4），而叙述者正是行使事件选择权和讲述权的行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叙述者掌握了叙述声音的绝对权威。随着叙述形式的不断变化，叙述者从口头叙述时代的显身实体到图像叙述时代的框架化存在，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转变，与作者、人物和读者间形成了时远时近的距离关系。

在口头叙述中，叙述者作为出现在听者面前的客观实体，对叙述行为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威。“重复的节奏是为了提醒正是这个相同的叙述者在讲故事”（科布利，2017，p. 29），叙述者不断强调自己的身份，即使口头叙述的作者大多属于某个群体而非个体，叙述者单凭一己之力就将叙述行为的主权揽入手中。当口头叙述向书面叙述转化，叙述这一行为转化为文字这一客观物理形态，其本体地位得到提升，人类不再只能通过叙述行为来把握叙述。叙述者却从此失去了实体形态，隐匿于字里行间，变为抽象的存在。书面叙述出现后，作者所有权逐渐得到关注和强调，早在十五六世纪，英国就已通过相关法令保护作者的权益。相较于口头叙述，书面叙述的叙述者倾向于躲藏在作者身后，在无形中行使自己的叙述权。在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和作者身份时常重合，叙述者企图借用作者身份完成叙述，“一直发展到19世纪蔚为壮观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包含着一个确定的叙事模式，即作者与叙述者的合一”（谭君强，2015，p. 199）。

然而叙述并不是被叙述者垄断的表意过程，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小说文本是一个多声共存的场所，小说的表意过程是多重声音相互对话和协商的结果。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的文论就已涉及叙述的多声现象。柏拉图在关于“模仿”的讨论中谈道：“模仿似乎是意味着对虚构人物所说的语词的精确模仿……反之，非模仿之事则与诗人的声音或人称相关。”（科布利，2007，p. 39）。柏拉图将叙述中的声音分为模仿（人物之声）和诗人的声音（叙述者之声）两种，叙述主体就此由拥有绝对权威的叙述者分裂为人物和叙述者两个主体。后来不少叙述学家提到的“场景”和“概述”两种叙述手法

实际是柏拉图理论的变形，前者指对人物的拟态或事件的还原，后者指叙述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压缩时间和空间来掌控叙述节奏。

叙述者总是企图让人物看似跳脱出自己的控制来叙述自我，却一直躲在人物身后掌控全局。科布利在书中谈及三种类似的叙述者暴露自己狡猾行径的表现。首先，引号的出现便于叙述者向读者展示人物身份，“将模仿问题美学化，同时也将叙述中的身份问题前景化”（科布利，2017，p. 43）。标点符号的运用是书面叙述用空间表达时间的方式，是对口头叙述的模仿。而引号的运用在视觉上将“模仿”和诗人的声音区隔开，赋予了人物一定的身份和权力。引号内的内容看似出自人物之口，实际上仍然从属于叙述者。叙述者看似让人物与读者直接交流，实际上仍在为人物代言。其次，方言的运用拉近了读者和人物的距离。“拉丁术语‘Romanice’，意为‘用方言书写’，不仅衍生出‘罗曼司’之名，而且也在‘小说’的词源学上起作用。”（科布利，2017，p. 48）如果说引号在视觉上为人物身份正名，那么方言则在语音上赋予了人物重要地位，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最后，现代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的出现模糊了人物和叙述者的界限，这似乎是口头叙述传统的复活。自由间接引语看似穿透人物内心，实则只是让读者以叙述者的身份和角度窥视人物，自由直接引语同样如此。这三种看似人物已挣脱叙述者控制的表现都是叙述者骗取读者信任的把戏，人物永远只能通过叙述者这个中介者发声。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新闻体写作风格，叙述者屡次尝试利用突出叙述内容的客观性来抹去自己在叙述中的痕迹，为读者提供一种虚假的自由。麦凯波（Colin MacCabe）认为，叙述者“用一种隐匿的方式来掌控读者接近现实，导致读者没有注意到它在运行”（科布利，2017，p. 58）。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即使叙述者鼓吹叙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试图消失于“客观现实”背后，但他始终作为中介式的存在横亘在读者和人物、读者和事实之间。无风格仍然是一种风格。

试图躲藏在作者和人物身后却以失败告终之后，叙述者又进行了另一种尝试：自我框架化。书面叙述过渡到图像叙述之后，叙述者的形态也从以前的人格态逐渐转为框架态。叙述者不再是一个拥有确定来源的声音，不再拥有人格化的姓名和身份，他变为一套叙述指令集合。赵毅衡认为，叙述者兼具人格—框架的二象性，“叙述主体在叙述框架内完成叙述，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双态的，既是一个人格，也是一个叙述框架，合起来说，叙述者是一个体现了框架的人格”（赵毅衡，2012，p. 22）。叙述者继从经验世界隐身之后，又在叙述行为中逐渐弱化自己的人格特质，在图像叙述中把自身完全抽

象为一个叙述框架，一套叙述指令。在电影中，镜头发挥“模仿”功能，剪辑则代表“诗人的声音”。导演、编剧和剪辑师等幕后人员充当复合叙述者的角色，叙述者的声音变得相对不易察觉，观众只能从剪辑行为中一窥“叙述代理的工作痕迹”（科布利，2007，p. 100）。甚至在梦叙述这种特殊的叙述形式中，由于不可直接观察叙述主体，叙述者几乎完全隐身于抽象叙述框架之后。

人类具有严重的视觉依赖，图像叙述在视觉上对现实的逼真再现似乎进一步掩盖了叙述框架的存在。随着 AR、VR、全息投影等拟真技术的发展，图像呈现的虚拟现实和感官经历的经验现实正飞速靠近。2019 年上映的《双子杀手》（李安，2019）号称以 120f/s+3D+4K 的技术开创电影的新纪元，打破叙述与现实的边界。但是叙述本质上“必须包括一个叙述者和多个任务，因此本质是多声部的（heteroglot）”（科布利，2017，p. 113），即使高帧率电影甚至将来的裸眼 3D 电影在视觉效果上以微小的差距逼近现实，电影叙述一度区隔内的标题、导演编剧署名和演员表以及二度区隔中的剪辑转场、镜头移动、景别选择仍然会提示观众叙述框架的存在。叙述中的一切现实都是假性现实，都是经过叙述者或叙述框架过滤的现实。

后现代叙述不再执着于用语言或图像追逐现实，后现代叙述者明白再现现实和经验现实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本体性鸿沟，于是他采取了“元叙述”的方式宣称再现现实的不可能性，叙述“宣扬其本身的真实性这一观念在虚构中被破坏”（科布利，2017，p. 119）。随着绝对真实的破灭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读者在阅读中的“能动作用激增”（科布利，2017，p. 130），文本意义倾向于个体化和多元化。作者权威式微，读者履行作者的部分职责，在阅读中“写作”，文本的意义完全向读者敞开。以超文本小说为例的可写性文本给予读者以叙述者的新身份，个体读者以“二次叙述化”（赵毅衡，2013，p. 106）的方式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本，读者也悄然进入叙述主体内部。当文本以未完成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叙述者似乎再次在读者身后玩起了躲藏游戏。

三、叙述内外主体的发展差异

叙述行为见证着其内外主体身份建构与重构的进程，叙述外的人类自我不断个体化、个性化，叙述内的叙述者自我始终无处藏身。从表面上看，叙述的形式似乎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再到图像的线性发展，但叙述行为中某些反复出现的特征似乎表明叙述的内部主体，即叙述者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循环

往复的过程。然而，不论叙述行为内部主体如何分裂融合，叙述作为人类构建自我主体身份的途径，始终能帮助人类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找到定位自我、诠释自我的方式。

在口头叙述垄断叙事的时期，叙述者作为显身个体形象出现，而作者多为某个群体的集体智慧；在现代主义小说盛行时期，叙述者和作者或合一或分离，相对来讲都拥有明确的个体身份；现代社会拥有程式化开头和叙述声音的电视剧似乎“继续履行一种‘吟游职能’”（科布利，2007，p. 122），而作者的身份则逐渐回归集体性概念。叙述主体经历整体合一阶段，分裂为叙述者、人物和作者等不同部分，在文本中形成众声喧哗的景象，现在的自媒体等叙述方式似乎又逐渐将三者合而为一。声音在口头叙述时期是唯一叙述媒介，在书面叙述和图像叙述早期销声匿迹，后又随着有声电影、播客等叙述形式的流行重新出现，承担叙述行为中的核心功能。口头叙述的模式仿佛从未被替代，从未消失。除形式之外，叙述内容从早期富有想象的神话史诗发展到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再到科幻文学，人类向天空抬头仰望，而后低头看向自己，如今又抬头将叙述欲望投射于茫茫星海之间。

不论叙述的形式和内容如何转变更替，不论叙述者、人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分裂融合，唯一不变的是叙述自始至终从未脱离帮助人类实现自我身份建构的功能。有关认知叙述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叙述行为在病人、囚犯等特殊人群中充当了疗愈创伤和重构自我的手段，“他们注意到其病患依靠希望，但是它们能够用来‘重构身体—自我关系’的不同类型的叙述有所不同”（科布利，2017，p. 151），“他们注意到囚犯独特的混乱经历以及他们试图创造‘情节’来处理这些经历”（科布利，2017，p. 151）。叙述行为与记忆的独特关联使人类得以整合经验自我。叙述行为一直锁定于人类自身，它为人类试图战胜时间、把握世界和构建自我的欲望所驱动。

叙述为人类书写历史，保罗·科布利则在为叙述这一行为书写历史。作者在《叙述》一书中为我们回溯了叙述的历史，展现出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所特有的主体建构功能。不论是否如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叙述具有生物性功效并需要一定的认知基础，叙述行为已然使人类从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赋予人类记录经验、巩固记忆、建立文化和认识自我的特权。

引用文献：

- 方小莉（2013）. 声音与权力：文本中的意义生产理论. 当代文坛，1，60—65.
科布利，P.（2017）. 叙述（方小莉，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谭君强 (2007).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124-127
- 谭君强 (2015).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 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江西社会科学, 4, 199-205.
- 赵毅衡 (2012). 叙述者的广义形态: 框架—人格二象. 文艺研究, 5, 15-23.
-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韵竹,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和文学理论。

Author:

Cao Yunzhu, postgraduate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arielcao1995@163.com